

绪 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

“文化”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说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的文化指“文治教化”。显然,与今天“文化”概念是有区别的。

当前,中外学者对文化定义,众说纷纭,多达二百多种。我们一般把文化理解为: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人类精神文化中的系统的思想理论是各种文化形态的理论基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等都包含着思想、理论、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因此,狭义的文化概念特指社会意识形态,诸如哲学、道德、宗教、历史、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等,我们这里讲的文化,基本取狭义的文化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很广,古代的衣食住行,器物用具,风俗民情,哲学宗教,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天文地理,以及礼乐刑政等典章制度,都是它的基本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气势恢宏,博大精深。它的悠久和辉煌是使每个中国人感到自豪。学习和宏扬中国传统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是每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精华与糟粕共存,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成熟在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15世纪以后,由于西方工业文明兴起,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明显地成为社会发展的

阻力。如封建专制制度、宗法等级制度、封建礼教，以及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社会心理等等，都是和近代化背道而驰的，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华民族受人欺侮，任人宰割，中国传统文化则故为酿成国弱民穷的根由之一，也承担了历史的责难，几度被全盘否定和彻底批判，它的糟粕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而其精华部分并没有科学地认真总结。只是近十几年来，欧美式的现代化模式度过了鼎盛时期之后，逐渐“世衰道微”，暴露出自身的弱点时，中国传统文化再度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人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其精华部分，有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一面。许多学者主张，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些优秀成分，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人后己的精神，等等，可以做为文化传统成为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的巨大精神力量。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些成分，如重个人道德修养、重群体价值观念、重人际的亲和社会关系、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等，若加以改造，注入时代内容，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利于人类和平发展乃至环境保护的。

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就是要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提高自身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审美素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在建设和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融合中西，学贯古今，构建光辉灿烂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内容，首先必须了解中国文化之根基，以提高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强化“振兴中华”的责任感。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她具有非凡的智慧和创造能力；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又是唯一绵延不绝，一直向前发展，从未中断的文化。当人们举步登上古老的万里长城，定会赞叹其气势磅礴，生命之恒久，根基之坚实。

一、中华民族的摇篮

中华先民自古生活在亚洲东部辽阔疆域内。从新生代以来，中国原始地貌的构成和现在差不多。

中国东临太平洋，境内高山、丘陵、高原、盆地、平原、江河、湖泊、岛屿交错纵横。在广袤的幅员中，南北冷热、东西干湿差异很大。地势西高东低、以下降，呈现明显的三级阶梯。天然植被从东南向西北呈现出森林、草原及荒漠三个地带。复杂的地形、土壤、气候和水文环境，构成了千姿百态的区域特色，并在各区域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的作用下，形成了大同小异的文化风貌，互补地表现出不同条件下的生存境况和心理状态，汇合成汹涌澎湃的中华文化洪流。这股洪流是一体和多元的统一，是以农耕文化为主流的多层次、多成分的有机复合体。

中国古代文明发源于黄河中下游。黄河流域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其范围包括太行山以西，秦岭以北，西起祁连山东端，北至长城的广大地区，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但是，除了泛滥作害之外，黄河又有便利文明发展之处。黄河流域地区，土质疏松，土性肥沃、适宜于农耕的发展，黄土又有特殊的柱状节理，容易挖穴构屋、冬暖夏凉，所以‘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墨子·辞过》）黄河流域对于先民定居聚处有着重要贡献。至今，陕西、山西一带仍喜爱窑洞式的民居。

黄河及其支流又便于原始聚居的先民文化交流，它带来灌溉和航运之利。黄河及其众多支流，恰如原始华夏文化圈的血管。营养着原始村落和农耕文化的发育。自古以来，黄色最为尊贵，帝王宫廷的装饰、皇帝的龙袍，皆尚黄色，赵匡胤就是在黄河边上黄袍加身而为皇帝的；帝王巡幸也是撒黄土前行，以示“皇恩浩荡”。古代中华民族把对于黄色的崇拜与权威崇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过去曾有些人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来源于西亚，从而编造了‘中华文化西来论’的‘神话’。建立新中国以来的 40 多年，历史学和考古学工作者利用大量的地下出土资料对这一“神话”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辨明了中国文化圈虽然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但其核心仍在黄河中下游，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母亲。据考古研究，河南裴李岗文化距今约七八千年，与河北磁山文化、甘肃大地湾文化构成仰韶文化的先驱，接着的仰韶文化则在黄河中游及其附近地区，分布极为广泛。继仰韶文化之后的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夏代文化、商代文化，在文化传统上是一脉相承，在年代序列上是连续发展，而成为中国以后文化发展的主体。

夏、商、周三代以及以后的秦、汉、唐、宋等均定都于黄河中下游，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黄河流域。

史学界曾有人认为夏代是传说，否定夏代，但东周的文献确认了夏代的存在；河南龙山文化及稍晚而又紧相连的二里头文化，无论从地域分布、地层关系、时代范围以及文化性质上进行分析，都说明二者应属于夏代文化。

我国现今民间流行的‘农历’，自古以来都称为‘夏历’或‘夏时’，特别适用于以农立国的民族，相传这种历法萌芽于夏代，有其一定根据的。文献记‘夏传子、家天下’，和考古发现颇有相似和相互印证之处。

“殷因于夏礼”，殷商王朝承继夏的礼乐制度，成为黄河中下游各方国的‘共主’，是‘三千诸侯’的领袖，不仅成为黄河流域一个最强大的稳定因素和核心力量，也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国之一。郑州南郊二里岗商城是商前期都城，经初步发掘，总面积共约 25 万平方米，城墙长达七公里，宫殿遗址面积达六万多平方米。

周革殷命，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又有了很大发展。到春秋时，《左传》所记诸侯二百多个经过战国七雄兼并，到秦始皇时扫荡群雄，定于一尊，较为彻底的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郡县

制的专制主义帝国。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童年时代就生息繁衍在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和华北大平原,黄河流域是开发最早的地方,也是中国远古和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带,从上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的“兰田人”,经过“北京人”直到龙山文化以及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源远流长,形成了世界上综合而特殊的农业体系,在世界古代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因此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文化植根于黄土高原和华北大平原,它是在世界范围内延续最久、影响最大、生命力最强的文化。它发源于黄土地带,再向周围扩散,波及整个东亚大陆和岛屿,向西伸入西域,在秦汉和唐、宋、元、明时代,中国文化灿烂的光芒照射在世界广大的土地上,在古代世界中的历史地位是无与伦比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设 36 郡,后又征服百越,增设闽中、南海、桂林西郡、疆域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南至越南北部和两广,西至陇山、川西和云贵高原,东到大海,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本规模。西汉时,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张骞通西域,设西域都护,争取乌桓归汉、设乌桓校尉,开发西南夷,闽、粤、黔、滇都设郡县。因此,秦汉时期,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建立,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楚、越、巴、蜀文化融汇在一起,秦汉中央政府为开拓边疆,强迫大量人口移居西北、岭南,使中原的农业文化深入到遥远的边陲。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大动乱、发生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先前居住在边缘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地区,在汉文化的影响下,绝大部分被同化。与此同时,中原广大汉族人民为躲避战争和自然灾害,自发向南方迁徙,少数移民迁到珠江流域和闽江流域。

唐安史之乱后至五代,北方又动荡不安。自北而南的移民洪

流持续不断。大量涌入珠江、闽江流域。移民在宜于农耕的新环境中保留了中原农耕文化的基质，使中国南部、东南部原百越文化区开始全面汉化。特别是北方的文人士南下、兴教重学、逐渐提高本地区文化水平，为宋代文化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宋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金、元先后崛起，入主中原。但是，这种政治形势并没影响中华文化的格局。入主中原的女真族、蒙古族大部分不久就被文化水平和人口数量占优势的中原文化所同化。两宋，中国政治中心转向东南，特别是靖康之乱后的数次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使东南浙、闽、赣地区成为全国文化水准最高的地区。元代，西藏正式成为中国版图，藏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汉藏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明代，以军屯为先导的大规模移民广泛进入云南、贵州；清朝完成了改土归流，从而云贵虽然以五彩缤纷的少数民族文化著称，但汉族的中原文化仍居主导地位。清代，满族入关，散居四方，融进了中原文化，而河北、山东的不少居民涌向东北谋生，农耕文化在东北得到发展。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大量福建人徙居台湾。汉文化取代了高山族文化居主导地位，台湾迅速与福建成为同一文化区。至此，除鸦片战争后被帝俄攫取的北部、西北部大片领土外，今天中国的 960 万平方公里领土已经确定。

总之，中华民族经黄河流域为舞台，增殖裂变，纵向继承，横向吸收，创造出悠久的没有中断的古老历史和传统文化。所以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在中华大地上，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独特之处，盖言之有三：

第一，总体来看，中国是一个受沙漠、高山、海洋所包围的国家，在地理上是一个较独立的自然单元，既有利于中华文化稳定，连续地向前发展；也造成文化发展的封闭性，其内部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不但具有天然的向心性，而且在物质生产与供

应上具有高度的内部互补，从而形成高度的自给性和独立性。

第二，中国国土大部分处于中纬度，尤其是东半部，气候、土壤、水利都适宜农业生产，因此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因此，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出现了西周礼乐文明和大一统的秦汉制度文明。西周礼乐文明强调社会各等级精神的和睦相处，敬天保民。秦汉制度文明强调国家的统一，同时重视伦常，安土重迁，自给自足，勤劳节俭等社会心理也逐步形成。这三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

第三，由于疆土辽阔，地域不同，生活条件各异，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统一基础上的多样性，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狩猎文化、渔业文化等等，既有一定的独立性，又与农耕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补益。统一性和多样性共存一体，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多姿多采。

二、中华文明的渊源

从远古开始，中华各族的先民就在祖国各地星罗棋布地出现，并相继形成了许多民族、部落。由于地理环境、生活条件、风俗习惯和历史传统的差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又由于共同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彼此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和联系，时有矛盾冲突，但更多的是互相学习、共同发展，民族间的融合和重新组合不断进行，最终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 56 个兄弟民族统一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

中国古史传说，中华文明的渊源，最早的是开天辟地的盘古氏，这是晋以后小说家言，并不能成为历史。其次是“三皇”“五帝”，这是周人总结当时古帝王的传说而厘定的，后世儒家一般以伏羲、燧人、神农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另外，还有少昊、女娲、祝融等，也与前所举互为进退，以配三、五之数。司马迁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态度，称“神农以前吾不知”（《史记·货殖列传》），故不言三皇，作《五帝本纪》。

按中国历史,共和(公元前 841 年)以后才有详细可靠的编年。从共和上推到禹,有大致的数,一般公认为禹起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古本竹书纪年》有“黄帝至禹为世三十”的记载。平均三十年为一世计之,黄帝至禹约有一千年左右,黄帝到现在有五千年了,这是中华文明史已有五千年的合理根据。

近几十年来,考古发现山东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陶文跟殷商的甲骨文一脉相承,因而,推断汉字的渊源,可逆溯到大汶口新石器时期,陶文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3000—2500 年之间。这正是“文明”“野蛮”前后两种文化,犬牙交错着的过渡阶段,说中华文明史,不能不从这个过渡期讲起。所以,中华文明 5000 年,是有根据的,合乎科学的。

人类的历史记载常以神话传说为开端,中国也不例外,黄帝、炎帝的神话传说,就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篇。黄帝、炎帝是兴起于黄土高原的部落领袖。如前述,依据世系推算,黄帝时代在距今 5000 年前,炎帝比黄帝早大约 500 年。

相传炎帝发明了农具、培育了粟,发展了原始农业;又遍尝百草,发明了医药。黄帝部落发明更多,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文字、衣冠和若干社会制度。黄帝的发明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对社会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炎、黄两部落有一支沿黄河东迁,进入中原地区,与九黎部落相遇,发生军事冲突。先是炎帝战败,接着炎黄联盟“涿鹿之战”打败九黎,杀死了他们的首领蚩尤。后炎黄两部落发生冲突,大战于“阪泉”(今河北、怀来县)炎帝败。自此,炎、黄、九黎三部结为一体,定居中原,成为“华夏族”,即汉族的祖先。据《史记》载,黄帝为五帝之首,颡项为黄帝孙,帝喾为曾孙,唐尧为玄孙,虞舜为黄帝九代孙。夏开国首领禹也是黄帝后裔,所以说,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观念。

大约公元前 2100 年,禹建立夏朝,历商至周史称“三代”。此

时华夏族有更大的发展,迨至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第一次中华民族大融合,中原周邻的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相继融入华夏族。秦汉时期,中原地区为汉族的一统天下。

东汉以后,历三国、两晋、南北朝,近 400 年,边疆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大量迁入中原,与汉族杂居相处,有的少数民族还建立了‘前赵’、‘后赵’等十多个国家。进入中原后,学会农耕,语言和习俗也逐渐汉化,到了唐初,其民族特性基本消失。这时期,印度佛教也大规模传入,被中华民族所吸收,逐渐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以至形成了以儒家为主的儒、道、佛三位一体的中华文化新格局。

宋至清,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契丹族、女真族、党项族都建立过政权,蒙古族和满族还先后建立起全国统一政权。

总之,三次民族大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处于民族融合之际的西汉、隋唐、明清,不仅是经济发展高潮阶段,也是中央集权强化和文化繁荣的兴盛时期,更是中国传统文化成熟、定型时期。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与传统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创造的传统文化,其中优秀部分必将在现代化的伟业中得到发扬,其劣质部分必被冲刷而淘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近几年,中外许多学者对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其特征进行了多种概括,有代表性的就十几种之多。

综上所述,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可以发现:中华民族以自己勤劳和智慧,自强不息的创造了世界文化史上唯一没有中断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有魅力之处,是中华文明最高成就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特色之所在。具体言之,有以下三点。

第一，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确是世界所罕见，在人类文化史上，一些古老的文化早已夭折，有的则消融在其他文化中了。如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古文化，都因异族统治，截断了古文化发展的长河。在有些地区后来兴起的文化与原来的古文化并不存在相同的血脉。只有中华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上少数特例之一，相当长的时期中华文化在历史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东面大海，西面高山，犹如两道屏障，保护着中华文化的孕育与发展。典型的农耕社会，以血缘为纽带，发挥群体力量，通过治水进入文明社会，春种秋收，周而复始，形成人们的永恒意识和悠久意识。重传统，重知识的积累，重文化典籍的著述，重道德精神，等等，凡此种种，都是中华文化传之悠久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传统道德精神是中华文化得以发展久远的主要动力之一。《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它支撑着这个民族历经磨难而坚持奋斗不息。中国人还相信“积德”是达到‘久远’的根本方法。一个人的长寿，一个家庭的历久不衰，一个王朝的巩固持久，都是有德的表现，司马光说：“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要达到天长地久，就在积德，这种观念对中华文化绵延悠久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融汇兼容。中华文化本质上是自我体系，主要内容中国人独创且绵延传承数千年之久。如汉字、中医学、中国绘画、中国儒学，等等。但是，中华文化又具有极强的融汇兼容的吸纳性宽容性。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汇接触时，多能吸纳，但始终以本土文化为主体融汇兼容。所以经几千年的吸收、融合，中华文化始终一贯的体系不动摇，这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独特现象。比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历经一个融汇兼容的过程，成为中国化的佛教。而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丰富，充实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中华文化吸收了印度佛教文化，即在艺术上丰

富了中国的绘画、雕刻、舞蹈、音乐。从历史上看,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也是很多的,但在近代以前,除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入侵曾造成较大冲突外,其他文化进入,并未造成严重冲突,表现了极大的宽容性。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充分表现了在学术上的宽容性,吕不韦统览百家,而有《吕氏春秋》。中华文化中,儒、释、道三教得以长期并存,甚或可并祀于一堂,都可由百姓同时崇信,等等。这种在文化上的开放精神,融汇兼容的博大胸怀是应该继续发扬的。

第三,稳定统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大一统的文化是反映了大一统的经济、政治要求的。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不断,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人们认识到战乱不已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统一的政权,天下安宁,必须有稳定的局面,统一的政权。反映这一历史客观要求,在思想文化上很早就出现了“大一统”学说。孔子提出“张公室,杜私门”;“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大一统”主张。孟子主张天下“定于一”。韩非更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政治设计。儒法思想结合,奠定了稳定统一的基础,并得到了后世广泛的认同和应用。

自秦汉以来,中国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虽几经内忧外患,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分裂局面,但“分久必合”。即使分裂时建立的地方性政权,也打出统一的旗号,而只要中原王朝强盛,地方政权就衰落,全国又复稳定统一。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无论是汉族,还是各少数民族都为创造伟大的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各族人民,比邻而居,交错杂处、互相通婚、贸易、传授生产、文化知识。自古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整体——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这是其具有统一稳定性的历史根源。同时,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整体意识的养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当前学习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就要继续发扬“爱我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振兴中华”,

再创光辉灿烂的中华新文化。

三、中华文明的标记

根据摩尔根、恩格斯讲人类社会的发展,分蒙昧、野蛮、文明三期。“文明”期一般指从氏族制解体,进入出现国家的社会阶段,在这个阶段已经出现了文字,并且常以文字出现作为“文明”的最主要标记之一。因有了文字,才能记录经验和智慧,代代相传,并且与其他地区进行交流。文字对文化的积累和传递起到媒介作用。文字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动力。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主要动力,即是汉字一脉相承沿用至今乃至以后。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中华文明的象征。

汉字起源,周秦诸子认为仓颉所造。《易经·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之以书契。”什么是书契 东汉郑玄说:“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考合。”(《系辞》注)又说:“书契谓出予受人之,凡要,凡簿书之最目,狱讼之要辞,皆曰契。”(《周礼·小宰》注)

根据郑玄说,可知书契类似买卖合同。《易经·系辞》认为后世圣人用书契代替了结绳记事。这圣人指仓颉。韩非子说:“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谓之囀,背囀谓之公。”(《韩非子·五蠹》)仓颉造字到了西汉就被神化了。(《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认为仓颉造字感动天地,天降粮食,鬼神夜哭泣,确是惊天地,动鬼神的壮举。

仓颉生平年代难以考证,但汉字一人造,不可信。他可能主持过汉字的整理规范工作。如荀子所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仓颉前早有了汉字,仓颉对汉字做了整理统一审定工作。

现在见到的最古文字记载主要是商甲骨文。至今已发现约十五万片甲骨,共有四千五百多个单字。其中已认识出来的字有一千多个。这些资料为我们研究商时代的历史、地理、科技和语言文

字等提供了重要依据。据推算甲骨文当是公元前 1300—1028 年之间的文字。这时的文字是很进步的了，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汉字已经形成了文字体系。这就意味着商的甲骨文字，已距文字的原始阶段很远了，就是说甲骨文的萌芽期，远在商王朝之前。

目前已经发现的与汉字形成有关的符号，是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刻符。

山东省莒县凌阳河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在那里出土的陶器上，有四个象形符号跟古汉字很相似。比如，其中一个符号很像是太阳在起伏的地平线上，或者是一片不规则的云层，这是个“旦”字，就是“元旦”“平旦”的旦。



汉字形成过程开始的时间，不会比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时代更晚，也就是不会晚于公元前 3000—2500 年之间。这个时间距现在约 5000—4500 年了。

汉字从殷商时代自成文字体系以后，在书写形式方面发生过多次重大变化，形成多种字体。商代和周代主要用甲骨文和金文；秦代主要用小篆，而以隶书为常用字体。汉代主要用隶，而草书、行书也已流行；魏晋到现代主要用楷书，而以行书为辅助字体。通常把小篆以前的文字总称为古文字。隶书是汉字形体演变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是古文字演变成现代文字的分水岭。

汉字的字体演变是有继承性的。新的字体只是取代旧字体而通行，旧的字体并没有消灭，在某些场合仍旧使用。例如我们现在通行楷书，但在写对联、刻印章、绘画题款等场合，甲骨文、金文、篆、隶书也常被使用。

汉字基本上属于表意文字，又早有形、音、义相结合的特点。汉字不同于表音文字，在它的字形里包含了非常浓厚的文化蕴涵。它早已超越了单纯象形阶段，而代表了表意文字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体现了理性的构形原则，几乎每一个字形都是有“说法”的。这从古代所谓“六书”的理论中即可看得很清楚。

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给六书下了准确定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会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总之，六书是秦汉时建立起来的关于汉字结构的一种理论。后世学者一般采用许慎的名称，班固的次序，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许慎用六书的理论，分析了九千多个汉字的形体，写成了我国第一部字书《说文解字》，使六书的理论得到极大的发挥，成为研究汉字的准绳。

《说文解字》共分为十四篇，另有序一篇。文字 9350 个，许慎的解说 133400 多字，字体以小篆为主。按文字的形体和偏旁构造分为五百四十部，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成为后代字典的先河。

《说文解字》是许慎整理编辑当时众多经学家、文字学家研究成果的一部总结性著作，保留了大部分先秦字体及其解释，是研究古文字学和古汉语不可缺少的典籍。

从殷商时期到现在，汉字的基本性质没有发生变化，这是至今世界上产生既早，从未中断，惟一仅存且被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

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究其原因有三。

第一，汉字记载了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辉煌的文化，它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的标记。

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是与汉字有直接关系。我们的祖先利用汉字记录并传播了古代东方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并主要依靠汉字保存和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炎黄子孙代代相传使汉字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第二，汉字规范着汉语的统一，以至在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实现国家统一，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带着固有的分散性，人民交际的范围狭小，方言分歧严重。但是，不直接表音的汉字，起到了规范、统一书面语的作用，并影响着口语的语法，词汇方面保持基本一致性，约束了方言的分化。汉语没有象印欧语系那样分化成许多独立的语言，汉字是有一份功绩的。同时，汉字不仅是汉族人民通用的文字，许多少数民族，如满、回、壮、苗、瑶等族的人民也多使用它。这对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维系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统一，都产生了并且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第三，时至今日，汉字完全能适应记录汉语的需要，不仅适应了记录古代汉语的需要，也适应着记录现代汉语的需要，因此，汉字经久不衰，并影响越来越大。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废除汉字呼声甚高。一些学者认为，近世的中国落后，在于科学不发达，而科学不发达在于教育不普及，教育不普及的主要原因是汉字太繁难。于是提出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主张。但至今没有一种拼音文字能够取代汉字，最多起注音的作用。信息量最大的汉字，最能记录现代汉语，并且已被成功地输入计算机，汉字不适应现代化的预言已被打破。汉字仍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文字，它是联合国正式使用的文字

之一。现在，汉字正越来越广泛地走向世界，汉字文化圈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汉字绝对不能废除、消失，如古埃及，巴比伦等文字成为博物馆的古董。

总之，汉字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是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几千年来，汉字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一直是神圣的，它受到珍视、受到赞美，汉字书法是中国一种独特的艺术、各种流派传承至今，仍为人们所钟爱，书法艺术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汉字在长期的使用中成了一种象征。它不仅象征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也象征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汉字是一种标记，它不仅标记了中华文明的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也标记着中华民族，独特而高雅的创造精神。

第一编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举要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是一座无比丰富，璀璨夺目的宝库。没有一个中国人（包括没读过书的人）没有受到过它的影响。很多深邃的思想精华，脍炙人口的名句格言，大多出在传诵千古之典籍中，象谚语一样，作用于人们的心灵，影响着行为方式；流传于百姓口里，传播于穷乡僻壤，尽管有些人并不知出处。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精神，必须有选择的阅读一点古典名著。早在 40 年代，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识》序中就指出：“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又说：“做一个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80 年代，叶圣陶先生在重印《经典常识》序中，又进一步指出：“经典训练不限于学校教育的范围而推广到整个社会，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因为，凝结在典籍中的传统文化思想，其精神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心里结构之中；其智慧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其文词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语言。经典中有哲学、有历史、有道德、有文学、有科学，涵储着传统文化的基因，在民族文化的世代传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作用。作为中国人，不论专攻什么专业，从事什么职业，都应了解中国典籍。我国近代老一辈的知识分子，那些有成就的人文科学学者、文艺家、自然科学技术专家，他们的传统文化素质都很高，这是他们成为大家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进行必要的传统文化典籍的基本训练，可以说其文化知识结构就是不